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60年中短篇小说典藏



1949—1956

站起来的声音

站起来的声音

1949—1956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站起来的聲音/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60年中短篇小说典藏)

ISBN 978-7-02-007614-7

I. 站… II. 人…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4590号

责任编辑:王 晓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韩志慧 责任印制:王景林

站起来的聲音

(1949—1956)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39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1/32 印张13.625 插页1

2009年9月北京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978-7-02-007614-7

定价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中短篇小说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随着时代的脉搏律动与发展,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之际,我们编选了自1949年以来在读者中享有广泛影响的中短篇小说精品,组成这套“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60年中短篇小说典藏”,作为我们的一份献礼。

本“典藏”大抵遵循如下体例选编:

一、划分各卷的依据大抵为作品发表时相关的文学及时代主题并以此命名。第一卷《站起来的声音》,从1949年到1956年,即新中国成立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提出;第二卷《篱下百花》,从1957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这段时期,虽然意识形态和文学创作理念有一定幅度的变化,但创作风貌总体变化不大;第三卷《丰盈的激情》,从1976年到1984年,这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文学表现的主题和思想解放紧密相连;第四卷《归去来兮》,从1985年到1989年,这一时期的文学,无论思想的生发,还是形式的构造,都进入到了更加多样的状态;其后的三卷,无论是1990年至1995年的《芳菲遍野》,还是1996年至1999年的《沉静的风景》,抑或是2000年至今的《山外青山》,中短篇小说的创作者们继续以不懈的努力,为丰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创作出了许多特色鲜明、质量上乘的佳作。当然,这样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事实上,近六十年来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与传承远比这样的划分要丰富得多。

二、中短篇小说各自在文体上的特征目前还是一个尚无定论

有待继续研究的专业课题,因此,为保持编辑体例的统一,收入本丛书的所有篇目不以中短篇划分而是按刊发时间顺序排列。

三、收入本丛书的篇目旨在反映各个历史时期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整体风貌和当时影响广泛的作品,因此,同一作者有不同作品入选不同卷集的现象难免出现。

四、本丛书虽已达七卷九册之众,但比较近六十年来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浩繁,则依然是“沧海一粟”;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9年5月

目 录

我们夫妇之间	萧也牧(1)
关连长	朱 定(19)
科尔沁草原的人们	玛拉沁夫(28)
山间铃响马帮来	白 桦(46)
不能走那条路	李 准(82)
洼地上的“战役”	路 翎(95)
老水牛爷爷	峻 青(137)
选举	秦兆阳(159)
春种秋收	康 濯(164)
我和我的妻子	俞 林(191)
粮食的故事	王愿坚(201)
风雪之夜	王汶石(217)
三月雪	萧 平(230)
喜鹊登枝	浩 然(261)
铁木前传	孙 犁(271)
爱情	李威仑(327)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王 蒙(349)
在悬崖上	邓友梅(385)
小巷深处	陆文夫(416)

我们夫妇之间

萧也牧

一 “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我的妻却是贫农出身，她十五岁就参加革命，在一个军火工厂里整整做了六年工。

三年前我们结了婚。当时我们不在一起，工作的地方相隔有百十来里，只在逢年逢节的时候才能见面。所以婚后的生活也很难说好还是坏；只是有一次却使我很感动：因为我有胃病，一挨冻就要发作，可是棉衣又很单薄！那年，正快下雪的时候，她给我捎来了一件毛背心，还附着一封信，信上说：

……天快下雪了！你的胃病怎样了？真叫我着急得不知道怎么着好！我早有心给你打件毛背心，倒也不是羊毛贵，就是钱凑不够！我就在每天下午放工以后，上山割柴禾，可是天气太短了！一下工，天很快就黑了！所以一直割了半个多月，才割了不少柴禾，卖给厂里的马号里了，卖了二千块边币，秤了两斤羊毛，问老乡借了个纺车，纺成了毛线，打了这件毛背心！

因为我不会打，打得又不时样又尽是疙瘩，请你原谅！希望你穿上这件毛背心就不再发胃病，好好为人民服务……

我读着这封信，我仿佛看到了她那矮小的身影，在那黄昏时

候，手拿镰刀，独自一个人，弯着腰，在那荒坡野地里，迎着彻骨的寒风，一把，一把，一把地割着稀疏的茅草……

她这样做，完全是为着我！为着我不挨冻，为着我“不再发胃病，好好为人民服务……”突然，我流泪了！可是我感到了幸福！

两年以后的秋天，我们有了小孩，组织上就把我们调在一块工作。那时，我们住在一个叫“抬头湾”的山村里。

每当晚上，我在那昏黄的油灯下赶工作，她呢，哄着孩子睡了以后，默默地坐在我的身旁，吃力地、认真地、一笔一画地练习写大楷……

山村的夜是那样的静寂，远远地能听见胭脂河的流水，“哗哗”地流过村边。时间该是半夜了吧，我想她又是照顾孩子，又是工作……一定是很累了，就说：“你先睡吧！”她一听我的话，总是立刻睁大了有点蒙眬了的睡眼：“不！”继续练她的大楷……直到我也放下工作。

早上，孩子醒得很早，她就起来哄：“嗯嗯……听妈妈的话，别把爸爸扰醒了……”孩子才几个月大，当然不懂得，还是嚷！于是她就蹑手蹑脚地起来，抱着孩子，到隔壁老乡屋里的热炕头上哄着去了。

闲时，她教我纺线、织布；我给她批仿，在她写的大楷上画红圈，或是教她打珠算，讨论土地政策……

每天下午，孩子睡着了，我们抬水去浇种在窗前的几棵白菜，到沟里帮老乡打枣，或是盘腿坐在炕上，我搓“布卷”（棉花条儿）、拐线，她纺线，纺车“嗡嗡”地响，声音是那样静穆、和谐……

虽然我们的出身、经历……差别是那样的大；虽然我们工作的性质是那样的不同；我成天坐在屋子里画统计表，整理工作材料；她呢，成天和老百姓们打交道！……但在这些日子里边，我们不论在生活上、感情上……却觉得很融洽，很愉快！同志们也好意地开玩笑说：“看你这两口子，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

但是，不到一年的光景，我们却吵起架来了；甚至有一个时候，我曾经怀疑到，我们的夫妇生活是否能继续巩固下去。那是我们进了北京城以后的事。

二 “……李克同志：你的心大大地变了！”

今年二月间，我们进了北京。这城市，我也是第一次来，但那些高楼大厦，那些丝织的窗帘、有花的地毯，那些沙发，那些洁净的街道，霓虹灯，那些从跳舞厅里传出来的爵士乐……对我是那样的熟悉，调和……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这一切对我发出了强烈的诱惑，连走路也觉得分外轻松……虽然我离开大城市已经有十二年的岁月，虽然我身上还是披着满是尘土的粗布棉衣……可是我暗暗地想：新的生活开始了！

可是她呢？进城以前，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深山、大沟和沙滩；这城市的一切，对于她，我敢说，连做梦也没梦见过的！应该比我更兴奋才对，可是，她不！

进城的第二天，我们从街上回来，我问她：“你看这城市好不好？”她大不为然，却发了一通议论：那么多的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男人头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得！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知不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血红，像是吃了死老鼠似的，头发像个草鸡窝！那样子，她还觉得美得不行！坐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整天挤挤嚷嚷，来来去去，成天干什么呵……总之，一句话：看不惯！说到最后，她问我：“他们干活不？哪来那么多的钱？”

我说：“这就叫做城市呵！你这农村脑瓜吃不开啦！”她却不服气：“鸡巴！你没看见？刚才一个蹬三轮的小孩，至多不过十三四，瘦得像只猴儿，却拖着一个气儿吹起来似的大胖子——足有一百八十斤！坐在车里，跷了个二郎腿，含了支烟卷儿，亏他还那样

‘得’！（得意；自得其乐的意思）……俺老根据地哪见过这！得好好儿改造一下子！”

我说：“当然要改造！可是得慢慢地来；而且也不能要求城市完全和农村一样！”

她却更不服气了：“嘿！我早看透了！像你那脑瓜，别叫人家把你改造了！还说哩！”

我觉得她的感觉确实要比我锐利得多，但我总以为她也是说说罢了，谁知道她不仅那么说；她在行动上也显得和城市的一切生活习惯不合拍！虽然也都是在一些小地方。

那时候，机关里还没起伙，每天给每人发一百块钱，到外边去买来吃。有一次，我们俩到了一家饭铺里，走到楼上，坐下了。她开口就先问价钱：“你们的炒饼多少钱一盘？”“面条呢？”“馍馍呢？”……她一听那跑堂的一报价钱，就把我一拉，没等我站起来，她就在头里走下楼去。弄得那跑堂的莫名其妙，睁大了眼睛，奇怪地看了我们几眼。当时，真使我有点下不来台，说实话，我真想生气！可是，她又是那样坚决，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她走！

一面下楼，她说：“好贵！这哪里是我们来的地方！”我说：“钱也够了！”她说：“不！一顿饭吃好几斤小米；顶农民一家子吃两天！哪敢那么胡花！”

出了饭铺，我默默地跟着她走来走去，最后，在街角上的一个小饭摊上坐下了！还是她先开口，要了斤半棒子面饼子、两碗馄饨。大概她见我老不说话，怕我生气，就格外要了一碟子熏肉，旁若无人地对我说：“别生气了！给你改善改善生活！”

像这类事，总还可以容忍。我想一个“农村观点”十足的“土包子”，总是难免的，慢慢总会改变过来……

哪知她并不！

那时，机关里来了不少才参加工作的新同志，有男的也有女

的。她竟不看场合，常常当着他们的面，一本正经地批评起我来。她见我抽纸烟，就又有了话了：“看你真会享受！身边就留不住一个隔宿的钱！给孩子做小褂还没布呢！一支连一支地抽！也不怕熏得慌！你忘了？在山里，向房东要一把烂烟，和上大芝麻叶抽，不也是过了？”

开始，我笑着说：“这可不是在抬头湾啦！环境不同了呵！”

她却有了气啦：“我不待说你！环境变了，你发了财啦？没了钱了，你还不是又把人家扔在地上的烟屁股捡起来，卷着抽！”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的脸刷地红了！站在一旁看热闹的青年男女同志们，本来看得就很有兴趣，这时候，就有人天真活泼地嚷起来：“哈哈！脸红啦！脸红啦！”旁的同志也马上随声附和，并且大鼓其掌：“红啦！红啦！”这一嚷，我的脸，果真更加发烫了！

.....

我发觉，她自从来北京以后，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边，她的狭隘、保守、固执……越来越明显，即使是她自己也知道错了，她也不认输！我对她的一一切的规劝和批评，完全是耳边风！常常是，我才一开口，她就提出了一大堆的问题来难我：“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展节约，反对浪费？”“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简单朴素的作风？”等等。她所说的确实也都是正确的，因此，弄得我也无言答对，这样一来，她也就更理直气壮了，仿佛真理和正义，完全是在她的一边；而我，倒像是犯了错误了！她几次很严肃地劝我：“需要好好地反省一下！”

我有什么可反省的呢？我自己固然有些缺点，但并不像她说的那样严重，除了沉默，我还有什么办法？可是，有一次，我忽然再也不能沉默了！我们破例吵了一架，这在我们结婚以来，还是第一次。

在今年六七月间，连日天雨，报上不断登着冀中和冀西一带闹水灾的消息。突然，她的精神也就随着紧张起来了！每天报来，她就抢着去看。我发现，她是专门在找报上所列举的水患成灾的县份和村名……她一面读着，不断地发出惊叹：“呵呵！怎么得了呀！才翻了身的农民，还没缓过气来，地又叫淹了！呵呵……”

有一次，我正在整理各地灾情的材料，她看着报，就大声嚷了起来：“这怎么着好呵！俺村的地全叫淹了！哎呀！日子怎么着过呀！我娘又该挨饿了呵！怎么着呵？哎？说呀！你说呀！”这我才发觉她是在征求我的意见。我出口说了句俏皮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谁也没法治！党和政府自会想办法，你操心也枉然！”冷不防，她一伸手，一指头直捅到我的额角上：“没良心的鬼！你忘了本啦！这十年来谁养活你来着？”我说：“反正不是你家！”她却真的又生我的气了：“你进了城就把广大农民忘啦？你是什么观点？你是什么思想？光他妈的会说漂亮话！”我说：“谁比得上你的思想！‘当当当’的好成份！又是工人阶级出身！”她把桌子一拍：“放你妈的臭屁！你别讽刺人啦！”就再也不理我了，好像很伤心的样子。

过了几天，我恰好得了一笔稿费：够买一双皮鞋，买一条纸烟，还可以看一次电影，吃一次“冰激凌”……我很高兴，就把钱放在枕头心里，不让她知道。

第二天，我正准备取钱上街，钱却怎么找也找不见了！心里真着急。我只好问她：“我的钱呢？”她说：“什么？钱？哪里来的钱？你交给谁啦？”我继续找，直找得头上冒烟！她却“噗嗤”一声笑了！我知道准是她拿了，于是我就很正经地说：“这钱不是我的！”“得了！你别糊弄我没文化了！稿费单上还有你的名字呢！”“是，是，我这钱，我有用处！我要去买一套‘干部必读’——十二本书！好好加强理论学习，比什么也重要！”“谁还知不道谁哩！加强你

的‘冰鸡宁’‘烟斗牌’烟去吧！”我一看不对头，只好恳求了：“你拿一半行不行？”她却说：“我早给家寄走了！”我不免吃了一惊：“真的？”她说：“糊弄鬼！”

我不知不觉地提高了嗓音：“这钱是我的！你不应该不哼一声就没收了！”哪知她的嗓音更大：“你没花过我的钱？嗯？你的花被面，你的毛背心……是谁的钱买的？”我说：“不稀罕！反正你得检讨检讨，你这样做对不对？”她说：“对！家里闹水灾，不该救济救济么？”我说：“你把钱捐给救灾委员会，那就算你的思想意识强，为什么给自己家里寄呀——那还不是自私自利农民意识！”她却真的火了：“反正是浪费强！今儿个黑价（今天晚上）你就不准盖我的被子！”我说：“好好好！”我一扭头就走了……

说也笑人！为了这么芝麻粒大的一点事，我们三天没说话，而且觉得很伤脑筋！恰好星期六那天晚上，机关内部组织了一个音乐晚会，会跳舞的同志就自动的跳起舞来，这正好解闷，我就去参加了。

我正下场，忽然发现：她抱着孩子来了！一看她的神色，知道糟了！她气冲冲地直蹿到我的面前，把孩子往我怀里一塞：“你倒会散心！孩子有你一半责任，我抱够了！你抱抱吧！”我说：“跳完这一场我就回去！”她二话没说，把孩子往旁边的“沙发”上一撂，雄赳赳地走了……

孩子不见他妈，就“哇哇”地号啕起来，和着手风琴的伴奏，发出一种奇怪的音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我红着脸，抱起孩子，回到卧室里去。只见她伏在桌上写字呢！我悄悄地走到她的背后一看，原来她在给我写信：“李克同志：你的心大大地变了……”她发觉我来，马上又把纸撕了！

孩子见了妈，挂着两行眼泪，笑着，跳着，“哇！哇！”地叫，向她扑去，她才接过孩子，解开怀来喂奶，一面走到门边，背贴着门，向我命令地说：“不许走！咱们谈判谈判！”

三 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

这些虽然都是非原则问题,但也恰好正在这些非原则问题上,我们之间的感情,开始有了裂痕!结婚以来,我仿佛才发现我们的感情、爱好、趣味……差别是这样的大!

她对我,越看越不顺眼,而我也一样,渐渐就连她一些不值一提的地方,我也看不惯了!比方:发下了新制服,同样是灰布“列宁装”,旁的女同志们穿上了,就另一个样儿:八角帽往后脑瓜上一盖,额前露出蓬松的散发,腰带一束,走起路来,两脚成一条直线,就显得那么洒脱而自然……而她呢,怕帽子被风吹掉似的,戴得毕恭毕正,帽檐直挨眉边,走在柏油马路上,还是像她早先爬山下坡的样子,两腿向里微弯,迈着八字步,一摇一摆,土气十足……我这些感觉,我也知道是小资产阶级的,当然不敢放到桌子面上去讲!但总之一句话:她使我越来越感觉过不去,甚至我曾经想到:我们的夫妇关系是否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幸好,不久她被分配到另一个机关去工作了!我欢欢喜喜地打发她走了,精神上好像反倒轻松了许多!

我想她这种狭隘、保守、固执……恐怕很难有所改变的了!她真是一个倔强的人!

我们分手以后,约摸有个半月的时光,她连电话也没来过,一个,却对旁人说:离了我她也能活!

可是,我却不能!即使我对她有很多不满,然而孩子总还是十分可爱的!我一想起那孩子的乌亮墨黑的大圆眼和他那牙牙欲语的神气,我就十分怀念!终于还是我先去找她去了!哪知道一见她,她却向我一挥手:“今天工作太忙,改日来吧!”

我说她真是个倔强的人。这评语,越来越觉得确切了!特别是又发生了几件事情以后。

当她到了那机关不久，找来了一个保姆：姓陈，叫小娟。样子很伶俐，她爸爸是个蹬三轮的工人。

那天正好是星期日，我在她机关里。那“老妈子房”里的掌柜，领着小娟来上工。一进门，指着我们俩，对小娟说：“这是小少爷的母亲，这是……”

小娟毕恭毕正地向她鞠了个躬，叫了一声：“太太！”哪知道我的妻，一听“太太”两个字，就像是叫蝎子蜇着了似的嚷起来：“呀！呀！别叫别叫！我不是‘太太’！我是我是……我们解放军里头没有‘太太’！我姓张，你叫我张同志好了！记住！我叫张同志！要不你就叫我大姐！”她说就把小娟拉到炕上，和她并排坐下了。弄得那“老妈子房”的掌柜，先是奇怪，接着也笑了：“对对！叫张同志！‘太太’那名儿，嘿嘿！不时兴了！太封建！太封建！”

我的妻马上就给小娟上起政治课来：说她自己也是个穷人，曾经受过旧社会的压迫，后来共产党来了，她就参加了革命，得到了解放……因为工作太忙，孩子照顾不了，所以请小娟来帮忙，这样，她对小娟说：“你也是参加了革命工作，咱们一律平等！和旧社会雇老妈子完全不一样……”

小娟听得很高兴，不住嘴地说：“您说得真好！您说得真好！”

小娟这孩子，虽说是伶俐，可是记性并不好！一不小心，常常又叫“太太”了！每逢这工夫，我的妻决不放松，一定及时纠正，并且又得上一堂政治课！弄得小娟反倒很不安了！

自从小娟来了以后，我的妻几次三番给我打电话：要我给小娟找识字课本、找笔墨纸砚……并且还给她订了学习计划：一天认五个字、写一张仿……一星期还有一堂政治课。我的妻自任文化教员兼政治教员。

每次周末的晚上，我去找她的时候，总是见她在给小娟上课，一本正经地念道：“穷人、要、翻身、团结、一条心、永远、跟着、共产党、前进。”小娟就跟着念：“穷、人、要、翻、身……”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点感动了！心想：她真是个倔强的人呵！

有一次周末的傍晚，我们从东长安街散步回来，看见“七星舞厅”门口，围着一圈人。过去一看：只见有一个胖子，西服笔挺，像个绅士，一手抓住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一手张着五个红萝卜般粗的手指，“劈！劈！拍！拍！”直向那小孩的脸上乱打，恨不得一巴掌就劈开他的脑瓜！那小孩穿着一件长过膝盖的破军装，猴头猴脑，两耳透明，直流口水……杀猪般地嚷着：“娘哎！娘哎！”嘴角的左右，挂下了两道紫血……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抄着手的、微弯着头的、口含着烟卷儿的……但是，都很坦然！

这情景，在我看来，也已经是很生疏的了！觉得很看不顺眼，正想问问，忽听得人群里有人喝道：

“住手！你凭什么压迫人！”嗓音又尖又高。

一眨眼间，我突然发现：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她，是我的妻！这时候，她昂头挺胸地站在那胖子的面前，正像武侠小说里所描写的——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的神气！我突然觉得精神上有点震动，但同时，马上又模糊地想：她真是好管闲事！不知道怎么着才好……

那胖子仍然一手拧住那小孩不放，一手贴到花领结上，很有礼貌地微微一笑！心平气和地向围着的人们说：“这小子，太可恶，太可恶！不知道的人，以为我压迫人，其实，不然！我这个舞厅，是在人民政府里登记了的，是正当的营业，是高尚的娱乐！拿捐，拿税……而他，这孩子，却用石头子儿，往里——”他一挥手，“扔！如果，把我的客人们，全撵走了，那么，我——又当如何呢……”他还想接着演讲，却叫我的妻打断了他的话：

“你说得对！这孩子扔石头子儿，也可以说是一个错误！可是，我们是有政府的有秩序的！不是无政府主义！就说他犯了天大的法，也应该送政府法办！你有什么权力随便打人？嗯？有什

么权力？你打得他满嘴流血，好像你还受了屈似的？嗯？让大伙儿评评理！”

这时候，人群里就有人嚷起来：“对对对！这同志说得对！”

有一个苦力模样的人，也就走到那胖子面前，转过身来，指着那胖子向大伙儿说：“这位先生说得不假！这小孩儿是往舞厅里扔了一个石头子儿！我亲眼看见的……”

胖子马上微笑点头：“诸位听着！不假吧？光凭我一个人说不行！不行！”

那苦力接着说：“可惜这位先生说得不全！那小孩儿凭嘛平白无故地扔石头子儿哩？是那么一回事儿：刚才他在舞厅门口向客人们要钱，这位先生撵他走，他走慢了一步，这位先生‘啪’地给了他一个响锅贴（耳光）！回头，过了一会儿，这小孩就扔了个石头子儿，就又叫这位先生抓住了。这我也是亲眼看见的！现在不是那个世道了，是人就得说实话！”

胖子显得有点不安了，掏出一块小花手绢来不住地擦额角，对我的妻说：“同志！我认错行不行？”说着掏出了一张五百元的人民币，向那小孩一伸，“给！买糖吃！哈哈！”

那被打了一顿的小孩，好像一切的仇恨，马上就消失了！把嘴角的血一擦，正想伸手去接，却马上被我的妻喝住了：“别拿！太便宜啦！一顿巴掌只值五百块钱？”

胖子马上伸手到口袋里，慷慨地说：“再加二百！”

我的妻却发了大火啦：“嗯！你真明白！你以为还在旧社会——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使鬼上树？哪怕你掏一百万人民币，也不能允许你随便压迫人；随便破坏人民政府的威信！走！咱们到派出所去！咱们是有政府的！”

围着的人也就说：“对对！”

.....

结果还是到了派出所。